

【语言学与翻译理论】

辩证的翻译观探析 ——论翻译中的矛盾统一性

王金安^{1,2}

(1.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翻译中“矛盾丛生”,其中有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矛盾,“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矛盾,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矛盾,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洋味与洋腔的矛盾,神似与形似的矛盾,异化与归化的矛盾,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等。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坚持唯物辩证法,遵循对立统一原则,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做到二者“统筹兼顾”,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把握住翻译的“分寸”或“度”。

[关键词] 矛盾;统一性;辩证法;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0)01-0108-04

翻译者的水平,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素养和艺术素养,还与他的翻译观有着很大关系,只不过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无论何人,一旦背离了科学的辩证法,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势必会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之失偏颇。

翻译作为一项思维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丛生”。翻译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矛盾的双方不仅是对立的,而且应该是统一的。对于矛盾的双方,不可顾此失彼,或重次轻彼,而应统筹兼顾,统一权衡。统筹兼顾也好,统一权衡也好,决不是“半对半”的对分,译者所要选择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心”,而是矛盾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

一、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

翻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的作者,又要为译文的读者着想。译者的职责是忠实于作者,准确无误地传达原作的风味。但是,由于译文是供译入语读者阅读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有一个在忠于作者的前提下,尽量适应读者需要的问题。

翻译是讲究社会效益的,译者必须充分了解当代读

者的各种需求,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因此,我们现在不宜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而宜用明快晓畅的白话来翻译;同样如此,译者也不宜用译入语某地区的方言去对译原文国家某地区的方言,那样会造成“文化错位”现象,会给更多的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张谷若在翻译哈代的名著《苔丝》中,书中的一些山东土话,如“抱上锅,撮上炕”^[1],不懂山东土话的读者是很难读懂的;即使有些人读懂了,他们也绝对体会不到英国“威塞克斯方言”的味道,只会感到一种虚假的“山东腔”。笔者认为,文学作品里的方言要对等传译是很难做到的,但却有一个“曲线”译法,就是把话译得“俗气”一些。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两国社会、历史、风习、传统等都不一样,而且两种语言间又有巨大的差异,译入语读者阅读译文时会遇到原文读者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为了便于译入语读者充分地了解原作,译者在原文晦涩难懂的地方,不妨略作“明晰化”处理等。

二、“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

翻译首先要“讲本分”,即译者要以忠实于原作为己任,不可随意改变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原作者是自由创

[收稿日期] 2009-08-26

[作者简介] 王金安(1965-),河南鲁山人,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原作者转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同时,译者需要对原著、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等进行全面研究,然后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出原作的神韵。因此,钱钟书告诉“能写作的译者”,要有“克己功夫”,不要“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

译者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种种限制,翻译时犹如戴着手铐脚镣跳舞一样,既要有足够的“克己功夫”,又要在语言运用上充分发挥创造性,把地道的原文转换成地道的译文。因此,一个好的译者,应掌握这样的翻译功夫,即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严格说来,翻译不是创作,而是“再现”,虽说“再现”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创造性,但这创造意识还要受到克己意识的约束。若你的译文最终能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那就可以称得上是创造性的翻译了。所以,翻译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相当”,不能求“一丝不走”,而只能求“惟妙惟肖”。事实上,“等值论”已超越了翻译的可能性,否定了翻译的创造性,硬把翻译推向了“机械对等”的死胡同,这对于翻译建设也是有害无益的。

三、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充分展现原作的“风味”,这“风味”亦包含风格。所以,一部文学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准确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但是,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译者将原作内容用译入语表达出来时,由于受长期思维定势和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的影响,译作往往体现出译者自己的风格。

如何处理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关系呢?林纾翻译哈葛德的小说和杨必翻译的《名利场》,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哈葛德原文粗糙,对话呆板,常混用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而林纾的译文虽不工致,但比哈葛德明快些,即林纾没有追随原作的风格,而是“以我为主”,使用了“很明快的文言”,翻译出了“在文笔上优于原作”的译文,使得钱钟书“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2]。所以说,如译文不能做到保持原著风格,起码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

理想的译法是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准确无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是一部讽刺作品,杨必在翻译时,充分发挥了自己文笔轻灵、俏皮的特点,真可谓如鱼得水,成功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杨译本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译文风格应与原文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译文的风格应该既是原作的风格,又带有译者自己的特色,只有如此,译文才能恰到好处地展现原作的艺术魅力。

四、科学性与艺术性

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科学派”和“艺术派”之争。董秋斯先生坚持认为翻译是科学,主张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而茅盾先生则注重翻译的艺术性,提出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理论。翻译具有双重特性,科学与艺术是翻译中的一对矛盾,也是两种最基本的方法,二者存在于对立的统一体中,每个译者都要辩证地看待和运用这两种译法,既不做单一的“科学派”,也不做单一的“艺术派”,而应集科学和艺术于一身,做一个“科学的艺术派”。在翻译实践中,将“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二者“统筹兼顾”,才能翻译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翻译不仅讲究科学,而且也要讲究艺术。首先,译者要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具备有关语言学、语义学、语法学、文体学、修辞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否则,他就不可能准确而透彻地理解原文的精神,在翻译时就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其次,翻译是语言的再现艺术,缺乏艺术性的译作是没有感染力的,只注重科学性而不讲究艺术性的译作,就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原作,背叛原作。另外,译者还要谙熟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之间的异同之处。唯有如此,译者才能在翻译中既保存原作的风味,又不露出令人难受的“翻译腔”,从而译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美译文。

理想的翻译家必须兼备两方面的能力:首先,对原文语言要具有外语学者那样的感悟力;其次,对本国语言要具有本国作家那样的驾驭能力。这两方面的能力越强越平衡,其翻译水平也就越高。王佐良、卞之琳之所以成为杰出的诗歌翻译家,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对英语语言和英国诗歌有着很深的研究,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诗人。杨必之所以能把萨克雷的《名利场》译得惟妙惟肖,就是因为译者不仅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而且还是一个文笔轻灵、俏皮的汉语作家。

五、“洋味”与“洋腔”

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方面竭力保存原作的风味,即“洋味”,另一面尽量避免令人头痛的洋腔洋调,即所谓的“洋腔”。从鲁迅先生的“不但移情,也要益智”的原则出发,原作的风味即原作的风貌与意境,也就是原文中的异国情调以及保存原文的语气、笔调、风格以至神韵等。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把原作的内容和风味忠实地传达出来,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尤其是原文中带有异国情调的概念,翻译中应尽可能地加以移植,以保持作品的民族色彩。实践证明,译者必须竭力将全文精神融会于心,力求与原作者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唯有如此,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出原作的神韵。

译者在传达“洋味”的同时,一定要避免逐字逐句地硬译。翻译选择字眼时,如同买衣服一样,最好不要现成的,而要“定做的”。这就是说,好的译文不应该是从词典里批发来的字眼。比如 but 这个词,不一定非要翻译成

“但是”、“可是”,还可以翻译成“不想”、“谁料”、“可惜”之类的字眼;nearly也不必一律译成“几乎”,还可译作“差点”、“险些”等字眼,要视情况而定。总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忠于原文的前提下,要尽量发掘汉语的韧性和潜力,作出晓畅自然的传译,即使移植一些“洋味”很浓的词语,也要做到通达自如,不露生硬拗口的痕迹,克服不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洋腔洋调”。

六、神似与形似

在用汉语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由于两种语言差异太大,我们往往只能求得“近似”,而无法达到“等值”。为此,我国翻译界先辈提出了“神似论”和“形似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将其视为圭臬,加以继承和发扬。

在翻译上,神似是指:翻译过程中,必要时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如词汇、语法、惯用法、修辞格等方面的羁绊,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译文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意境。最早由茅盾首先提出神似;此后,郭沫若、闻一多在论及诗歌翻译时提出要译“风韵”、“精神”和“气势”;陈西滢、王以铸等也都著文论及;上个世纪60年代,傅雷提倡了“重神似不重形似”。自此,“神似”的翻译主张迅速传播开来,并为我国译界普遍接受,成为中国译论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译论之一。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上译文与原文在形态、结构、排列、辞格等方面的相似。翻译是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表达方式的手段,在翻译中适当地借助于形似,可丰富译入语,例如译语“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丁克族”(dink)等先后被汉语吸纳。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形似,必将以形害意,因为两国文字词类不同,句法结构不同,文法与习惯不同,修辞格律不同,俗语不同,观点角度不同,风格传统信仰不同,社会背景不同,表现方法不同。所以,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神似与形似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对于如何掌握神似和形似的尺度,最理想的翻译应是神形兼备,“以形写神”,通过形似表现神似,使形神浑然一体。小赫胥黎有一篇小说《Two or Three Graces》,描写一个叫Grace的女人。她根本没有个性,嫁了三次,人生观随夫而变。一位译者将题目译作“二三其德”,女主角的名字译作“其德”,“德”暗示Grace。“二三其德”源出《诗经》,后为成语,意为不专一。这就是形神兼备的一例,风味隽永,似有神助。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尽量地译出原文的形象语言,甚至体现出原文的优美形式。比如,卞之琳用相应诗体翻译《哈姆雷特》,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通过“存形求神”,充分传达了原作的神韵和风味。当然,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只有形似而缺乏神似的作品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当两者不能兼用时,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也就是说,采取意译的办法,传其“神”而舍其“形”。

七、异化与归化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的一对主要矛盾。1813年,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3]施氏只是对这两种途径作了描述,并未冠之什么名称。1995年,Lawrence Venuti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ation),将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on),一个要求“接近作者”,一个要求“接近读者”,非常“原则化”,具有较强的界定性。

一般来讲,异化是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时间就是金钱”一语,就是从“Time is money”异化而来,后者出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84年写的论文《致青年商人》(To Young Tradesman),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而归化则指翻译上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如林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赛珍珠把《水浒传》归化翻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傅东华译的《飘》中把美国的人名、地名全都中国化翻译等。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讲辩证法。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有主次之分,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欲达此目的,无疑必须要走异化的途径,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折中”手段,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然而,异化和归化虽有主次之分,却不存在高低之别,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都不能圆满地完成翻译的任务。所以,笔者以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异化;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则应该进行必要的归化。简言之,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既然异化和归化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译者在具体运用中,就应该讲究分寸,不可走极端,遵循翻译的适度原则,要求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汇点”: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不会导致“文化错位”现象^[4]。因为过分的异化或过分的归化,都会给译文带来损害。

八、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我国译论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直译派”强调尽量保存原文的语言形式,“意译派”则强调尽量使用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乔曾锐在《译论》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对直译与意译的含义做了论述,并对两者做了如下界定:“在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

况,译文刻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这种翻译方法叫直译。使用译文语言中功用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以代替原作中因两种语言不同而无法保留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做到虽失原作形貌,但从不同范围的上下文看,仍不失原作的内容而且与原作的风格相适应。这种翻译办法叫意译。^[5]

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翻译。例如:Lying on his back.这句话译作“卧在他背上”是死译,译成“仰卧着”才是直译。直译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达到忠实于原作的目的。所谓意译即以原文内容为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亦即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的翻译。巴尔胡达罗夫把意译看成是“层次偏高的翻译”。当译者经过曲微探幽,需要改变形式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时,则就采用意译。因此,直译和意译是针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提出来的,讨论的重点是形式和内容关系。原作的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形式就是该原作所运用的各种表达方式、修辞手段、词句结构、语音格律等。我们是通过它们来理解原作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丰姿的。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中两种最基本的方法,二者存在于对立的统一体中,缺一不可,每个译者都要辩证地看待和运用这两种译法。一般来说,“神形皆似”的译文通常是直译的结果,就是译文不仅要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译者在酝酿表达的过程中,应该先从直译试起,如果直译能晓畅达意,则坚持直译;如果直译不能完全达意,译者也要知难而退,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转而采取意译法。笔者认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它们各有所

长又各有所短,可能时尽量直译,必要时尽量意译,两者并用不悖,甚至可以交错使用;直译时不漏生硬拗口的痕迹,意译时不有损“原汁原味”。但在确实行不通的情况下,也不要勉为其难,否则,会造成弄巧成拙的后果。

结 语

以上乃笔者总结我国译界前辈的译事经验,并结合自己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概括总结了翻译辩证论的八种关系,并对之做出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当然,翻译辩证论远不止这八种关系。译论家认为,翻译的根本问题是要掌握好“分寸”或“度”。所谓掌握好“分寸”或“度”,以笔者之见,就是要处理好以上种种矛盾。在翻译实践中,有的译者,本身的语言与艺术素养也不低,但由于缺乏辩证的翻译观,翻译中存在着重此轻彼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译文中也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因此,笔者认为,要恰当处理好翻译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译者应当全面贯彻辩证法,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坚持对立统一法则,一分为二地解决翻译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统筹兼顾,统一权衡,进而把握好适度原则、分寸原则,才能把我们的翻译推上一个新水平。

[参考文献]

- [1] 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63.
-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5.
- [3]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4] 王金安.论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矛盾统一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22.
- [5] 乔曾锐.译论[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244-291.

An Exploration of Dialectical View on Translation

——On Contradictory Unity in Translation

Wang Jin'an^{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2.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lin Aerospace College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ll sorts of contradictories in translation, of which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conception of restraint and innovation, the style of the author and reader, scientifically and artistically, the original lifelike and the alien flavor, spiritual similarity and formal similarity,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etc.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deal with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both sides of contradic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and unity of opposites and dialectical view on translation.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consideration of sides” and the most acceptable “connection” of both sides, obtaining “appropriatenes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ntradiction; unity; dialectics; view on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张树武]